

欣喜与振奋：2009 年文学印象

□文 羽

2009 年对于文学界来说无疑是极个重要的年份，与举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的整体氛围相适应，文学事业、文学创作均迎来了大面积丰收。特别是文学座谈会成功召开，刘云山同志在会上的讲话就文学创作的精神价值取向问题、时代主旋律与多样化问题、作家要开掘社会生活深井问题、继承与创新问题、以更宽广的胸怀面向世界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多有启发意义和指导意义，引起文学界广泛热烈反响。在这个年度里，文学界精神振奋，创作势头昂扬，呈现的诸多亮色让人欣喜与振奋。

2009 年是我国加快文学“走出去”步伐的一年，150 余人的作家团大力度参与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在论坛、签售、联谊等环节中均彰显了中国作家的自豪。主动登上或主办多个国际性文学论坛，建立多个国际写作营，推出中国作家翻译计划等等，主动发出我们的声音，积极开拓文学工作的国际视野，显示了中国作家积极面向世界的自信，对中国文学的带动和鼓舞意义都极为巨大。

中国作协对网络文学这个平台的积极关注、引导也富于成效，比如，建立知名网站联系会制度，制定业内约束性规范，盘点、理清十年网络文学发展情况，梳理网络文学思路，对网络作家主动进行培训，也已产生积极影响。人们普遍意识到，网络文学在经营盗墓、鬼怪、玄幻等类型化写作之外，吸收纯文学营养其实更为重要；同时，业内也认识到了积极遵守相关规范对于网络文学发展的必要性。

在作家维权方面，2009 年也成果突出。中国作协为中国作家集体维权，与谷歌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较量，斗争还在进行之中；发表公报，为毕淑敏、周国平和史铁生、棉棉等作家维权，赢得多方好评。在多个作家著作权利受到保护的同时，加大清理“问题会员”的力度，获得广泛认可。作家普遍感到创作、生存环境日益改善。

创作的收获也让人欣喜，作家面对新中国的来之不易，面对新中国 60 年的成长，文学的书写格外庄重与勤勉。作家们回顾往昔、面向当下，努力以形式多样的文学创作向祖国母亲献上一份厚礼。那些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作品，那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作品，在本年度留下很深的印记，得到了较一致的社会赞誉。比如，王树增的非虚构巨制《解放战争》全面叙述解放战争几大战役艰苦壮烈的历程，基于丰富史料基础上的充沛细节和鲜活的人物形象，构成作品无可置疑的文学质感，深深吸引了读者。正因为没有刻意提炼、咀嚼、编织，使得人们深感新中国来之不易，读罢对我们的领袖与先贤敬意倍增。老作家林希的中篇小说《岁月如诗》对一个学生时代入在解放前夜生死相许的壮烈之举的描写，举重若轻，感人至深。还有大量作品从不同角度歌颂祖国建设成就，反映各行各业的新面貌，唱响了高歌猛进的时代旋律。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我的天堂》把苏州一个城市 30 多年的发展与国家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写出了文脉昌盛之地经济腾飞的历史必然。黄传会的报告文学《为了那渴望的目光》对“希望工程”20 年的深情回顾，反映了这项事业背后党和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对贫困人群子女的深切关爱。蒋巍的报告文学《灵魂的温度》聚焦弘扬和实践感恩图报、甘于奉献的传统美德的“春晖行动”，张杨父母恩、家乡情、祖国恋，重现一个个感人的实例。胡银芳的纪实文学《英雄大爱》对新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不朽功勋的歌颂，是从邓稼先与夫人许鹿希相互托付一生的角度来写的，透过素朴而扎实的叙事，人们感觉到“只有永恒才是有价值的”这句话的分量。触及医疗改革问题的王鸿鹏的《十三亿人乐了》，从一个医院改革后的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20 世纪是一个呈现了异常复杂的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如何走出历史与观念的迷雾，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中国文学在外来文学的影响下吸纳、排斥、调整、转化、变异与自我创造的过程，进而探索现代化与本土化相纠葛的历史进程，无疑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核心要义之一。上世纪 90 年代，范伯群、朱栋霖先生曾领衔完成《1898—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备受学界注目与好评，被誉为改变了现代文学史研究格局的重要著作。而今由朱栋霖教授主编的续著《1949—2000 中外文学比较史》，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和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最新成果，实是在特别值得关注的学术大事。新书煌煌百余万言，史论结合，纵论中西，笔走龙蛇，站在新的文学观念和企业文化立场上，对 20 世纪后半叶、尤其是近 30 年来更加多元复杂的中外文学关系史展开系统研究。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复杂背景下，全面梳理和审视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生成与艺术发展，揭示出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化、本土化的历史面貌和深层文化肌理。

进入 20 世纪下半叶，尤其是近 30 年以来，中国文学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自我存在，而是不断地处于中外交流互渗、参照比较、借鉴吸纳的过程中。哪怕是在五六十年代的特殊文化政策的规约中，具有鲜明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文学，依然是在国际性的左翼文化文学潮流中展开的，依然创造和探索着一种特殊形态的与世界的对话的民族文学样式。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所有重要的艺术观念变化与探索，也包括思想文化意识上的种种突破，都不能离开外来思想文化潮流与文学经验的影响，有时甚至是一种直接的模仿、呼应与追赶。无论 80 年代的伤痕和反思、先锋和寻根，以及九十年代以来纷繁多样的个人化、欲望化与消费化；无论是思想精神层面的持续索求，还是生命感官的释放张扬，以及形式结构乃至思维方式的求新求变，都是在开放时代的多元文化碰撞、多样文学交流中展开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有过形形色色的迷失，但也切实地努力着转化与再创造。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就是在前所未有的中国向世界敞开、同时也主动走向世界的宏大变革中，通过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交流，走出自我迷失，实现自我创新，把自我融入世界的历史。因此，梳理中外文学关系是中国当

新面貌入手，反映了医疗问题实际上关乎对人的关爱、呵护，也凸显了人口压力背景下医疗问题的紧迫。与此同时，几个全国性的主题征文也收获了惊喜，如人民日报社、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主办“放歌 60 年”征文活动，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祖国在我心中”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征文，《诗刊》《民族文学》杂志社等举办“祖国颂”征文活动或推出国庆专刊，共收到来稿数万件，老中青几代作家感情充沛，以小见大，记录时代发展，见证历史巨变，歌唱祖国，礼赞共产党的领导，颂扬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留下了不少思想和艺术品格俱佳的作品。

而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年的氛围中人们看到，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发展与多元共荣呈现令人更为惊喜的局面。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少数民族作家写作人数增加，创作水准明显提高；人口较少民族作家逐渐大踏步走上文坛，55 个少数民族作家都有了自己的书面语作家和中国作协会员，他们对自己民族历史、现实和生活有着更牢固而执著的依恋，笔下文字的多元素彩吸引着更多的人。比如，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是世界性“重述神话”的项目之一，作品的成功显然有赖于作家的深厚积累与知性照耀，不单通过对藏族史诗史的全新诠释，激活了格萨尔王在人性与神性、使命与伦理之间的挣扎的历程，而且更深层次地反映了藏民族的智慧和坚韧。历史与现实、主人公与说书人两条线索，大大拓展了作品蕴涵的思想价值。土家族女作家叶梅的小说集《妹娃要过河》对土家族历史文化，以及对女性命运的揭示，融汇了作家对南方那片热土的炽热之情与深情眷恋，体现了女性作家的扎实功力。满族作家叶广岑的中篇小说《三岔口》《小放牛》等对传统文化的礼赞，对人性的细致揭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第十二届高级研讨班，对 55 个少数民族作家进行为期数月的培训，通过学习、实践提高少数民族作家素质，促进多民族文学共同繁荣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民族文学》藏、维、蒙文字版创刊出版成功，有效扩大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落成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正式开馆，为民族文学教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文学作为“人学”的力量在 2009 年继续得到彰显，一大批作品因直指人心的深度引起关注。比方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正如《人民文学》的授奖词所言，着重揭示了“在茫茫世间，人寻求安顿，人的孤独无从告解，他迎风而行，寻找和等待千万句中那直指本心的一句”。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围绕一个偏远山区小学里几位民办教师常常陷入困顿、无奈和琐碎的生活，展示了中国乡村知识分子怀着希望的执著、坚韧与质朴的精神品质，也传达了作者对乡土社会发展中国面临的多种复杂问题的反思。高建群 的长篇小说《大平原》对上世纪 20 年代末到现在西安附近平原地带不平凡历史变迁的反映，写出了中国老百姓经受的苦难、人性的光辉，写出了今天是历史的延续的真理，特别是把现时代普通群众中蕴藏的伟大精神耐力做了充分的揭示；传统白描与大众意的相济，显出了作品成熟的大气象。王晓鹰的长篇小说《长街行》通过对上海一条巷子里普通居民命运的书写，细致入微地反映了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是女性在时代剧烈动荡中的思想与情感轨迹。同样，曹征路的《问苍茫》、王十月的《无碑》，以沿海地区底层打工族的命运为主线，体现了对城乡矛盾、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思考，对普通人的命运寄予的同情让人感慨。钟求是的小长篇小说《零年代》取材小人物的感情生存、生命和生育的新难题，折射出大时代背景下人面临的诸种情感困境，有着较

■评 论

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中国声音

——评《1949—2000 中外文学比较史》

□高洪福

代文学研究必须要挑战的学术课题，中外文学比较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治史应该贯彻的学术方法与思路。《1949—2000 中外文学比较史》所做的工作，就是以新时代中国学者的开放胸襟和学院派的严谨学风，客观冷静且又全面深入地总结、清理和反思在中外文化、文学交流对话中所形成的中国文学的当代经验，采用一种与历史本身相呼应的学术方法探索新的当代文学史编撰形式，突破既有的当代文学史研究格局。在这一次发掘和重审历史的学术开拓中，无论经验的阐发，还是思想的创新，都将对已经踏入新世纪的中国文学以重要的理论启示。

由于现代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的历史特殊性，从中外文学关系的角度开展中国文学史研究，研究者所持的文化立场往往是至为重要的。这不仅反映着研究者的主体性问题，也最终联系着研究成果的价值生成。《1949—2000 中外文学比较史》“绪论”开宗明义地指出：“当代中国作家回应外来文学影响时的主体自我创造与对本土文学的建构，是我们研究中外文学关系时重点关注的的问题。”这种以我为主的学术自觉，与那种在“西学东渐”浪潮中把比较研究等同于对照比附的习惯思维截然不同。这也是朱栋霖等学者一贯的立场与追求。早在研究“1898—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时，他就致力于研究在本土文化传统的主导性作用下，中国文学是如何实现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因此，在《1949—2000 中外文学比较史》一书中，围绕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叙述学、荒诞派、表现主义、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女性主义等文学思潮，以及卡夫卡、劳伦斯、昆德拉、布莱希特、梅耶荷德、川端康成、村上春树等作家理论家，在传播史的细致扎实的梳理中，朱栋霖及其研究团队特别注重对中国本土接受语境的考察，注重探析潜隐纷繁的外来文化景观中的“本土文化潜在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创作主体、

创作现象的具体研究，揭示其中复杂的交流、碰撞、冲突、对抗、变异以及再创造关系。这种研究不是将中国文学视为西方文学的翻版，不是将异常丰富而又独特的当代中国文学经验简化为西方理论思潮的注脚，乃是要发出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的中国学术声音。这种学术追求也体现在研究体系的设计中。全书特辟专编讨论“儒家文化与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探索士的精神在近 30 年文学中从张扬到淡化的复杂流变，并以相当清醒和冷静的学术态度提出了一个相当严肃的现实问题：“在多元化的时代，作家如何以个体的方式实现他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如果说，开放性的本土文化立场所《1949—2000 中外文学比较史》提供了一个幅面开阔的文化话语空间，而贯穿其中的以“人的发现”为核心的文学本体观和文学史观，则实现了其对 50 年来复杂中国文学经验的纵深透视，也形成了全书的文学史论体系和审美价值系统的完整性。而且，正是由于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人的发现”的全面深入阐释，使得文化的本土性与文学审美的历史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研究者的本土文化立场真正落实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经验中。

朱栋霖提出：“什么是贯穿与推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何根本性因素激发和规约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纷繁复杂现象与诸种创作方法更迭、流派纷呈重组？一句话，就是对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和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也就是说，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贯穿和推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朱栋霖在长期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中提炼出的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能够不断被激活和丰富的文学史观念，也成为他开展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论核心，构成了把握复杂多元的文化与文学现象的汇通之径。《1949—2000 中外文学比较史》在中外文学交流的复杂背景下，既深入系统地思考人的观念如何历史

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军事文学、部队题材文学的疆域里，多样化的创作景观依然体现得较为充分。其中周大新的长篇小说《预警》尤有开拓意义，作品虚构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部队高级干部进行多方面诱惑以窃取军事机密为主要线索，提出当今军队干部必须提高抵御各种风险预警的能力这一重大课题，情节曲折，叙述老到，人物形象现场感强烈，极撼人心魄。年轻作家王凯的《全金属青春》则通过军校学员生活的描写，刻画了一群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年轻生命的激昂与热烈，赢得了不少好评。徐贵祥的长篇小说《马上天下》延续了作家一贯凌厉、奇幻的风格，通过对一位大别山区财主之子陈秋石从书生到我军高级将领、极富历史传奇的一生的描写，反映了上世纪初到解放前后广泛的社会生活，对战争与和平、勇敢与怯懦、忠诚与背叛等问题进行了有深度的追问。福建作家阎可欣的长篇小说《地平线》、湖北作家何存中的长篇小说《太阳最红》对我国红军历史的形象刻画，部队作家王波的纪实文学《毛泽东出兵山西》等作品对我军领袖战略决策的个性化再现，也很有感染力。

海外华人作家创作的集体上扬，是 2009 年的一个突出现象。多种人生经验的书写，多样化的艺术追求，显示了蓄集后的力量，为我们打开新的域外之窗，将绚丽的景致推在我们面前。人们发现，这批作家出道虽有迟有早，但创作态度一律严谨、执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肯花大量精力进行华人命运的史料辑查，所以能揭示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华人漂泊史内幕，并凭创作主体自身的文化敏感，将笔触探入现代文明的深处，在不同族群文化中展示海外华人作家对人生价值、对生命意义的深度探寻，所表达的中国人 的精神特质和价值信念尤其令人生出多样感触。比如，张翎的长篇小说《金山》通过一家三代人在加拿大数十年的艰辛闯荡，凸现了华人极为顽强的开拓精神与生命中特有的韧性。陈河的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以一种游侠式的轻逸之笔，演绎了一位加拿大华裔青年在“二战”中的悲剧人生；高产的严歌苓推出的长篇小说《寄居者》有“中国的辛德勒名单”之韵致，书写旧上海中国姑娘与犹太青年的那段情感往事，充满了偶然与纷乱、忠诚与背叛的凄美情调，把动荡时代人们的美好追求汇在笔端，让人难忘。为见证海外华人写作力量的崛起，《人民文学》特辟“新海外作家专号”。从其中所集中呈现的陈谦、袁劲梅、张惠雯，及前文提到的陈河的作品看，这些远行的人们，他们的文学开辟新的天地，他们的状态显示了汉语文学前途的不可限量。

同时，在本年度文学创作中，也反映出一些新老问题仍然存在，在困扰着文坛，创作力的旺盛与群众满意度的差距依然存在，文化总体繁荣前提下文学影响力的不足依然明显，创作数量大与质量低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人们不满意那些表现个人欲望、缺乏生活底蕴的作品，但事实上，这类作品往往数量还不小。人们痛恨“官本位”“长官意志”和“潜规则”，但那些以官职为书名的所谓“官场小说”却占着不小的文学图书销售份额。这些作品往往住于花哨的情节中展示着很陈腐过时的观念，有意无意地推崇了权力崇拜等观念，引起不少人的反感。同时，人们也提出，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想力可提升空间巨大，文学的世界影响力需要思想的冲击力，这也是多少年来被反复证明的。其实，机械复制也好，想象匮乏也罢，都源于人们对思想力的漠视，如果我们满足于跟在市场后面，以提高文学的 GDP 为主要旨归，就只能在克隆或模仿中兜圈子，离现实越来越远，离普通群众的生活越来越远，文学的精神也就会更多地流失，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而审美地体现在文学主题、文学人物、文体形式以及叙述抒情方式的发展变化之中，又努力透视 50 年来中国文学在接纳吸收外来影响的基础上如何立足本土表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与情愫、欲望与追求、生态与心态的艺术经验。不因思想的探索而忽略审美的丰富，也不在艺术现象的解析中冲淡理论的含量，实现了文化立场与文学意识的历史对接。

在当下中国新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环境中，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如何进入当代中国文学的叙述，“上帝死了”“力比多”“人的荒诞性”“他人即地狱”“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人的异化”如何渗透和改铸着中国作家对于“人”的发现与表现，对于人的非理性生命、潜意识存在的思考如何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当代表达，黑色幽默文学所称榜的反英雄性和强烈的怀疑和否定精神、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人的文化属性的重视与强调以及对人的文化自立与价值主体意识的重新呼唤，后现代文化主义思潮所带来的世俗性的、欲望消费的、消解主体性的人的观念以及叙述学背后的普通人、抽象的人、模式化的人，此外还有女性主义、基督教文化等等都围绕着“人的发现”这一文学本质论观念、文学史观念与比较文学研究核心方法论展开。而这一切又并非仅仅是在思想层面展开，研究者注重从文学现象的文学出发，特别强调对于人学观与艺术观的缝隙、形式与意义的落差、手法借鉴与思想转化的关系的研究。诸如西方叙述学形式移植背后人的观念的“错位对接”，90 年代小说后现代主义历史叙述背后的复杂性，布莱希特与中国新剧探索的关系等，都体现出强烈而自觉的文学本体关注和批判意识。

在宏阔的学术视野中，《1949—2000 中外文学比较史》实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的重要突破，其中的多项专题都富有开创性学术价值。比如八九十年代中国基督教文学研究就是一个全新的有价值的学术生长点。书中全面系统地挖掘出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的书写形态与精神价值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建构起了解读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框架，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探究的空间。此外，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与八九十年代小说，川端康成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新感觉”写作，村上春树与九十年代都市小说等，也都是颇具学术价值的开拓性研究。

■关 注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五四”时期的文学先驱以及由“五四”培养出来的更新的一批继承五四精神的有志者，除了在新文学的创作上向前奋进，也开始有意识地做着中国文学史的拓荒工作。譬如中国小说史方面的《中国小说史略》(鲁迅 1924)、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陈钟凡 1927)、中国诗史方面的《中国诗史》(陆侃如、冯沅君 1931)等。无论是对创作史的研究，还是对批评史的研究，这一时期都呈现出一种葳路蓝缕且欣欣向荣的景象。

以“五四”新的理念观照下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正是在这一时期初步奠定的。不过，对后世影响更大的好像不是陈钟凡 1927 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而是稍后即 1934 年郭绍虞出版的同名文学批评史。从 30 年代到 40 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了长足的进步，且许多有着中西养学的学者添进了这个行列。朱自清、方宗岳、罗根泽、朱东润、黎锦晖等辈。而尤以稍前的郭绍虞和稍后的罗根泽所作贡献最著。其实，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在 1934 年出版的。因为罗的批评史不是一个全本而只是下限南北朝，所以缺少了像郭绍虞那样的广泛影响。革故鼎新的 1949 年之后，郭与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事实上“约定俗成”地成了中国官方的“钦定本”了。这倒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如那些年代里的政治因素)，而是因为这两个不同的版本，代表着当时国内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最高成就，因此它们所享受到的待遇，也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郭绍虞的版本。正是这两种《中国文学批评史》历史的影响，它们甚至规约着国内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向、研究方式、研究趣味，以及大致相近的的研究体例和撰写体例。

郭绍虞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以中国朝代更迭的通常分期为纲，以特定朝代里的文学批评现象和重要的文学批评者(理论者)为纬；或者说，以朝代为局、以文学批评现象和重要批评者为点(棋子)进行文学批评“史”的梳理和研究。这种写法，自然是受到了中国历史通史的影响，而且也与中国哲学样式大致是相通的。我们今天来看，这种编写体例，当然不存在什么先进与落后的问题，而且我们从郭绍虞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得知，两书不仅具有葳路蓝缕的奠基之功，而且也具有多方面引发新路径的创新之功。前者大约是我们所共识的，而后者并不为所有人认同。在新材料的发掘、使用上，由于限于著者的经历、学识，更由于当时新材料的发现捉襟见肘，因此，无论是文学批评现象，还是重要的批评人物，以及文学批评史的“脉路”，有可能出现一种相同的思维惯性，或者相同的评价体系和评判标准。朱东润先生在写自己的《中国文学史批评大纲》时，就曾担心自己是否会“有心的抄袭”。作为时代和人身局的局限，这不是谁的过错。不过，当我们现在面对它们时，我们也许可能应有另外的思考。

因此，我们期待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

其实对于这一点，罗根泽早在几十年前(1958 年)，就先知似地看到了。罗根泽认为中国的文学批评与西洋的文学批评的区别在于，中国的文学批评侧重“理论”，而西洋的文学批评侧重“裁判”。罗还指出，这种“理论”是创作者与批评者之间的朋友关系所引起的。由此推论出中国没有职业性的文学批评家。但是，罗不是批评中国的这种文学批评现象，而是给予了这种现象以赞扬。罗认为，西洋的文学批评史从职业的批评人出发，疏离了创作者与批评者之间的关系，而中国的创作者与批评者——譬如曹雪芹与脂砚斋——的关系是一种“反事”关系，而是正是这种“反事”关系，让中国的文学批评更加通达与圆润。也许，这种观点和立论是罗根泽最重大的发现。但是这种关系，却导致中国文学批评的非理性。由于这种“反事”的朋友关系，使得中国的文学批评像《文心雕龙》和《诗品》这样较为系统较为理性的文学批评著作凤毛麟角、寥若晨星。也就是说，像散见于诸子百家中的文学批评、两汉儒生注经中的文学批评、明清的小说评点，以及发展到灿若星云的诗话词话，都是文学批评者(包括朋友、私塾弟子和隔代私塾弟子)某时某地的个体生命感悟。这种批评方式确实有着它独具魅力的地方。也就是说，它在考量和呈现个体文学感悟方面，有着最为质感的美学效应(事实上中国的画论也是这样的)。这与西洋文学批评里的“条分丝抽”的理论认定是大不一样的。尽管建立在个体感悟上着手书写的中国文学批评有其独具魅力的地方，但因此它流于“支离”和“破碎”却是很难避免的，而且还有可能造致垢病：中国的文学批评就如主人的“跟巴狗”一样。当然这是一极端端的说法。

事实上，我们已经从罗根泽这种描述中发现了罗根泽对此的担心。罗指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注”《楚辞》和杜诗的书多如牛毛，但是“批评”《楚辞》和杜诗的书却很少。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史，先天就有其不足，即它缺乏理论体系的建构。譬如对杂案的如“性灵”“肌理”等多种说法，到目前有没有一个成系统的界定。又如，由于 20 世纪考古的发掘、新材料的提供、西洋文论特别是二战后西洋文论的引进，会不会使中国的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研究趣味发生与上个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奠定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不同的变化呢？甚至发生完全不一样的变化呢？并不是专治文学批评史但却是中国学养深厚难有人所及的金克木，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就曾指出过，“专业的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当然依照自己传统的古典的思想体系，固守自己的领域，对新的探索不会有热爱大的兴趣和信任”（见金克木《文学评论的新问题》）。这段话自然不是批评现在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但是金克木的担心和批评却表明了中国目前文学批评史的现状。同时，这段话表明了由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于今的某些窘境，而且差不多可以说“一针见血”。也就是说，如何在古典与当代、固守与创新方面超越前辈，恐怕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写作在新世纪的新任务。尽管我们已经知道，近 20 年出版的一些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已有了某些变化，但是新编写新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没有逃脱郭、罗的影响和规约则是显而易见的。

文学批评史(不仅是通史，也包括断代史)，当然侧重点在“史”，包括对文学批评事件的选择性记录和不同视角的编辑，然而，仅有“史”是不够的，还要有“论”，而且是富有创意的“新论”。

本版责编：刘 颖 饶 翔

期待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刘 火